

老师请的护理工出来，我们才与护理聊上几句，再到病床前看看任老师。任老师说了句，你们怎么来了？我立即暗示大家都不要吱声。随后护士给任老师换药，我们只能退出来。

我们坐在医院门口，当时想不能与任老师说话，也希望与他女儿任琬洁说几句才能回去。最终转机出现了，护士告诉我，任老师下午一点钟想出动晒太阳！我们高兴不已，飞奔青岛路小餐馆吃饭等着陪任老师出去晒太阳。谁知一点钟再到医院时任老师已晒不了太阳了。我们再进去时，他依然能微弱的声音依个叫我们的名字。

任老师在病危时仍想了解学生的成长。他叫我在他床边汇报自己的情况，他说：“你说，我听着，我不吱声。”我了解任老师的脾气，希望得到一些精神鼓舞。于是，我把近年一些省、市或高校给我一些虚浮的头衔、称谓或微不足道的影响力一股脑地向任老师汇报……“并且按您的要求、指示，又取得……突破！”我说，所有这些都是任老师精心栽培的结果啊，但仍远远达不到老师的要求，见到老师仍惭愧。任老师听了非常高兴，不断点头，偶尔插话，始终露出满意的笑容……我也鼓励任老师，您一生学业顺利、家庭顺利，事业也顺利，下一代也争气，在美国考上研……这场病只不过是人生一个坎，过去就行了。任老师却对我说能好起来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说着说着，任老师不知是睡了，还是失去知觉两三分钟……我们离开时任老师仍不忘的是自己学术，对胡美博士说，“我一直想把我俩的博士论文重新出版成一本美国援华史。我说的你不要指望我，我说的是你！”任老师在离开前两天与另一同门念兹在兹的也是两本未完成的书稿！

任老师就这样一个对自己学业始终不懈、执着追求的学人！走出病房，我立即感觉必须立马加快对任老师的治疗与抢救。我让任老师的姨妹与他女儿任琬洁电话联系上了，我告诉她立即做一件事，就是把任老师的病况与相关检验报告翻译成英文，向美国各大知名医师求援。琬洁满口答应说没问题。我回家之后，仍为任老师的病牵挂与焦虑。我又联系上我的一位老朋友——江苏省卫生厅机关党委书记，这朋友也豪爽地答应帮忙——立即帮忙在鼓楼医院联系好了医生与床位，并明确表示拒诊不对，且承诺若知道拒诊护士姓名马上查！他还介绍无锡有一家专门研究所。所有这一切都办妥，吴耘老师也给我电话了。我再汇报给任老师，让他选择方案，他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任老师给我只有两个字回复“谢谢！”这便是任老师留给我最后的话，及无尽的思念。

任老师走了，他的豪情、他的潇洒，他的睿智与渊博，让每每我们相聚时总是享受欢乐的时光，今后这些不会再有了！

任老师走了，他再也不会为一个词、一个不规范的注释，生我的气了，但我也没有了几乎是一年之内连发五篇核心期刊的成果了！

任老师走了，少了一双关注我的目光，少了一个我的每篇文章必看的读者、热烈讨论者与鞭策者！

任老师走了，少了一位，为我人生起航，为我自豪，为我成长担心，我最珍重、最亲近的良师益友！

任老师走了，我一夜未眠，我为您祝福，我为您祈祷，望恩师一路走好！

2013年5月3日凌晨1点50分初稿

2013年5月3日7时修订稿

忆吾师任东来教授

胡 美

任东来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一个星期了，我却始终无法接受任老师已经离开的事实。我曾亲眼看见躺在病床上虚弱不堪的任老师，我不相信他会被病魔击溃；那天手机频频响起，一个又一个短信告诉我，任老师已经走了，我仍在怀疑上天能如此狠心带走一个如此生动的人吗？！当我看到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关于任老师病逝的消息时，看到苍白的讣告上明明写着任老师名字的时候，我仍在侥幸，这个世界上是否有另一个和他同名同姓的人？！这几天里，我无数次地设想自己再次回到南京，再次造访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我相信，任老师一定会再次盛情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坐一坐！

在这七天里，我忍不住地一次又一次哭泣、伤心、流泪、失眠甚至心绞痛，所有的关于和任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一遍又一遍地在心头涌现、在眼前晃过，始终挥之不去。

一、“美援”师生缘

2005年，我硕士要毕业了，就业形势并不是特别好，无奈之中，我只好选择了考博。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美国援助的问题，因此，硕士导师组的张亚东老师便推荐我考任东来老师的博士生。我知道，任老师是美国问题研究的专家，经常在高级别的刊物上看到他的文章，在报刊上读到过他的专栏文章，这样一位老师，我还真的有点不敢高攀。后来，我从网上获悉，任老师早年曾是美国援华方面的专家，从事过美国援华史的研究，还出版过一本《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在学界反响很好，影响很大。也许是出于对美国援助问题的兴趣，这才让我鼓起报考任老师博士生的勇气。

2005年春，我第一次见到了任老师，当时他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堆老师中间，我第一眼就认出他来，儒雅、浑身洋溢着书卷气，比我此前在网络上看到的还要年轻。老实说，面

试中，我表现并不好。第一次与自己崇拜敬仰的大学者面对面交流，我几乎六神无主、手足无措，而任老师思维敏捷、非常善于提问，他一连串的问题问下来，我便捉襟见肘。我以为任老师一定在面试环节就“毙掉”了我。不过，幸运的是，最终我还是被录取了。

得知自己被录取的消息，于我，忐忑多于兴奋。我来自一个非常普通的学校，师从名校名师，面试中就已经见识到老师的博学多才，心中颇多不安。忐忑之中，我就给任老师打了电话，任老师热情洋溢地给我推荐了几本历史书，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和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当时我在电话中很纳闷，任老师是研究世界历史的，为什么给我推荐的全是中国史的中文书籍。当我读完这三本书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在任老师看来，学问真的不是仅仅局限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之中的“专业”，而是通过大量涉猎、精读经典、触类旁通而获得，不由得暗自佩服。从现在看来，任老师所拥有的如此开阔的视域和境界应该是他治学有成的重要原因。在后来跟他的一次聊天中，他也曾说到过，女学生做学问写文章会有一个较为普遍的通病，视野会相对狭窄一些，所以他希望女学生能够更多接触到自身研究领域以外的背景知识。看来，任老师在最开始指导我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这样的问题，并希望通过他的引导而尽可能避免。无论如何，我们的师生缘分就这样开始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别的学生读博士读三年，任老师却给了我三年半的指导。

我太幸运，不得不承认，我不是任老师最优秀的学生，却因此而得到了任老师更多的指导和关照！我去南京的第一年，任老师正好去美国做“富布莱特学者”，一开始，我真的有点担心任老师无法指导我。但很快便证明我的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之间频繁的邮件往来解开了我所有的疑惑和心结。据我不完全的统计，任老师在美期间，我们的邮件往来二十多封。多数的邮件是任老师教我如何读书、如何做学问以及为我修改论文。关于历史学者如何读书，任老师说，“对历史学者来说，史料越老（原始）越好；著作越新越好。这就要求学者，多去档案馆看文献，常去阅览室读期刊。”而在读这些文献和资料的时候，他还特别强调做笔记。“笔记主要是一些最突出的观点，以及史料或书目信息。”记得任老师回国后不久，他还曾跟我强调过“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他告诉我，现在他还留着当年读书时记下来的大本的笔记。我当时想，任老师记忆力那么好的一个人，尚且要做大量的笔记，何况我呢，于是在他的建议和倡导下，我也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经常翻阅，获益无穷。虽然此前他大力推荐的几本书都是中文书籍，但当我真正开始跟随他做博士，开始学习和研究美国史的时候，他强调，“光看中文期刊远远不够。美国的杂志，必须经常翻阅，有兴趣的文章要坚持读完，虽然可能要花不少的时间。但据此，可以了解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在论文的选题时，他把自己博士论文选题的经验拿出来跟我一起分享，“在中国做美国外交史，要做出点名堂了，只有中美关系史了。因为在史料上，你除了可以掌握中国现代史学者不熟悉

的 Foreign Relations of Untied States (FRUS)，还可以发掘一些美国学者没有利用的中文文献。我自己的博士论文，就是走这一条路。”他特别强调，跟不同学科的学者和学生交流碰撞能产生新的思想火花，“做民国期间的中美关系史，要多与民国史的学生交流接触，取长补短。我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与近代史所的研究生汪朝光交流得来的。”

除此之外，任老师大量的时间还用来给我修改论文。在南京的第一年，我还是很勤奋的，先后写了4篇与司徒雷登相关的文章给任老师发过去。不管论文质量的高低、选题的好坏，任老师都非常细致地修改，并给出非常中肯的意见。任老师不愧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和评论家，一篇文章从选题到结论，从文章的切入点到文章的结构，从材料的选取到参考资料的运用，他都能提出非常中肯而又富于建设性的意见。与此同时，任老师的评论中令我最受鼓舞的一点是，他总是能发现一篇文章中的闪光点，他的这些发现总是能给我诸多继续努力的力量。更令我感动的是，虽然任老师并没有看重这4篇文章，但他依然每一字每一句给我修改，告诉我如何更好地表达，更好地措辞，甚至细致到标点的运用、译名的规范甚至注释的规范等。

任老师的学生应该知道，任老师打字并不灵活，并且不能十个手指灵巧地配合起来打字，因此，打字的速度无法跟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同日而语。那一封封长长的、满满的邮件，那一定是花费了任老师相当长的时间，甚至占用了他用来休息的时间才一字一字地敲进去的。他写给我的这些邮件，当今天拿出来再读的时候，我真心责怪自己当年年轻不懂事，老师那么长的邮件写过来，也不知道感谢老师一声。也许正印证了这样一句话，大恩不言谢！如此师恩，岂止一个谢字可以表达？！

也正是在这些邮件当中，在老师一字一句给我修改论文的过程中，我才真正完成了做一个严谨学者的启蒙，才开始真正地懂得如何去读书、选择什么样的书、如何去找材料和运用材料等等。我的基础那么差、起点那么低，我不知道任老师是否对我很失望，但一年下来，我很明显地感觉到自己进步了。就在任老师回来的那个学期，我就写出了一篇终于让任老师认为有价值的论文来，它就是《论 1946-1947 年美国对华军火禁运》，这篇稿子是我和任老师发表在《美国研究》2007 年秋季刊上的《1946-1947 年美国对华军火禁运的几个问题》的初稿。

最终我还是确定将美国援华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实际上，这一领域是任老师一直都希望继续做下去，却又没有找到充足的时间来做的。因而，对于这一选题，任老师是寄予了很高的期待的。我白天去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晚上回来将这些资料补充到论文当中来，每周上课的时候能够跟老师交流最新的发现和心得。那段时光过得很快，论文的进展也不知不觉地快起来，因为有快节奏的学习和思考，也因为老师敏捷思维和高屋建瓴的指导。这里不得不说一句，任老师惊人的记忆力。早在 2002 年，任老师就改做美国宪

政的研究，虽然偶尔还会做点中美关系的评论，但早已不是他最核心的研究领域了，但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研究、资料和书籍，他却记得一清二楚，清楚到连作品发表的杂志、出版社、年份，甚至月份和译者都记得一清二楚。在这个网络数字时代，像任老师这样博闻强识的学者真的不多见。

让我惭愧的是，虽然任老师是美援方面的当之无愧的一流专家，三年时间里，为指导我花费了他格外多心血和精力，但的确因为个人基础太差，知识储备不足，我的博士论文依然没有能够达到令他满意的水平。如果说，让我跟其他博士一样，答辩后直接将论文交给出版社，我可能没有这样的水平。在任老师看来，博士论文是一篇论文，而交给出版社的是一本书，一定是要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做大量的修改才能做到的。毕业后，任老师还曾多次问及我博士论文的修改情况，可我却一直没能抽出一段时间来专门修改。幸运的是，我也曾两次跟任老师谈起过论文的后期修改和完善的问题，并对此征求过他的意见，他也给出过较为具体的意见，这给我将来的论文修改提供了宝贵的方向性和指导性的意见。2011年，他甚至建议我投稿到正在征稿中的中美关系丛书系列争取能够出版，因为他一直希望我的论文能够纳入到一个有影响力的丛书当中出版，这样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但因为当时的稿子不甚完善而作罢。

感谢美援，因为它成就了我和任老师的这段特殊的师生缘分；感谢任老师，因为他的精心指导，我初步具备了成为一个学者的基本素质，并有机会选择对外援助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继续从事与援助有关的学习和研究！

二、可怜天下师者心

2008年，我从南京大学毕业了。当我决定放弃广州和长沙的工作机会，选择来到浙江的一个小城市的时候，我心里颇有几分惴惴不安。因为如果我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将是任老师的学生中第一个不在省会以上城市工作的。不仅如此，如果我选择这样一个单位的话，我必须放弃美国研究转而从事与非洲相关的研究，我担心任老师是否会认为，学生这样的选择辜负了他几年来对我的辛勤栽培和指导。任老师的学生出门远行后一般都会给老师报个平安，因为考虑到事情比较复杂，我特意到任老师的办公室汇报情况，想争取他的支持。我把浙江的情况跟他详细地汇报后，我在等待一场艰难的辩论，即说服口才一流的任老师支持我的这一决定。让我意外的是，当我表达了这一意向后，任老师却欣然认同了我的决定。他说，学校的研究机构是个不错的选择，首先，研究机构可以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安排出来专心从事研究工作，同时，因为身在学校，可以享受到学校才有的假期。

实际上，对于任老师来说，他的支持与其说是对这个小城市的认同，还不如说是对我个人意愿的尊重，并不能代表他对这一小城市的信任。半年后，我邀请任老师来我们学校，任

老师欣然受邀，来到了这个他戏言“绿化带上种着蔬菜”的城市。在这里，他看到了这里上乘的自然环境，青山绿树、空气洁净、水源纯净，工作条件也相当不错，方才放心。此后，他时常鼓励我扎根这里，安心从事非洲领域的研究。

我毕业准备离校了，任老师打电话给我，让我到他办公室。如同父母要嫁女儿之前，要跟女儿说说心里话一样，任老师跟我聊天。因为毕业前，我曾住过一次医院，任老师还特意去医院看我，因而，他依然很关切地问及我的恢复情况，并让我今后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考虑到我立刻要进入工作岗位，这虽然不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却是我的第一份以研究为业的工作，研究工作的最大特点是时间冗长而自由，因而，充分地利用时间显得特别重要。他特意告诉我，每天上班的时候，给自己列一个工作计划，按照工作的重要性高低，一项一项来做。直到现在，我几乎每天还习惯给自己列一个计划，时间自由却不散漫。

可怜天下师者心！学生毕业了，老师对学生的牵挂却始终如初。毕业后来到了工作单位，因为工作的需要，我转而从事与非洲相关的研究，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曾让我踌躇徘徊，每每此时，我总是会打电话或者写邮件给任老师，虽然我已经从南京大学毕业了，并转而从事着与美国研究毫不相关的研究，但每次总能得到任老师的谆谆教诲。在这里，我不得不说，任老师的知识涉猎面实在是太广，即使是当时学术界很少关注的非洲研究，他仍能给我提供一大堆的有关非洲研究方面的选题和有意思的研究方向，并介绍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和作品。

毕业后，和众多的师兄弟妹一样，我偶尔也会有机会到南京出差或旅行，任老师一定会邀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坐一坐，聊聊我们现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成绩和困扰，那份轻松和畅快，至今记忆犹新。

我也是一个老师，凭心而论，一个老师要做到这样，非常人所能及也！

三、漫漫回宁探“亲”路

当我得知任老师生病后，我第一时间发信息给他，他回复我说，“我还好，不用挂念。”在这种时候，他想的都不是自己，而是不要让学生过分担心。当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虽然经历了好几轮的化疗和放疗，口腔溃疡很厉害，但从他的语气和口气上判断，他对生命的热爱依然没有受到疾病和治疗的丝毫影响，一如平常，他十分关切地问起我最近的工作和生活。说到工作，他还特意强调说，“一定要注意把握工作的节奏”。当我跟他表达我想过去看看他时，他说，我在这里还好的，这么远跑过来，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最后，他跟我约定，到明年夏天的时候，你们来南京。他的这句话让我对“明年夏天”充满着期待。

因为受到严重口腔溃疡的影响，他说话虽然偶尔有点模糊，但声音依然洪亮，他的思维依然敏捷，从他的语气上来判断，我似乎还能判断出任老师不时流露出来的微笑。似乎正是他的非常放松的状态给我传达了过于乐观的信号，似乎正是他的自信和乐观让我并没有太早

意识到这个病魔的强大。因而，当仅仅几个月后，我得知任老师化疗的效果不太明显，病情出现反复时，我辗转反侧，彻夜未眠。

一种强烈的冲动让我无比想念病中的任老师，我决定要尽快去看望他。当我买好了车票，准备带着仍在喂奶的孩子前往南京看望日思夜想的老师，我却意外地接到了吴老师打来的电话。不知道吴老师从哪里打听到我要去南京的。在长达半个小时的通话中，“他一定不希望你和孩子受舟车劳顿之苦！我的想法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这对从来都为别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的夫妇，似乎已经习惯了用这样一种思维来考虑问题，哪怕是在这种时候，他们依然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在吴老师的极力劝阻下，我只好退掉了这张车票，而吴老师却还在抱怨退票又得“损失不少钱”。

虽然被师母“劝退”了，但想看望任老师的想法却没有打消。两个星期后，任老师的病情已经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之前一直住院的军区总院不敢再收治任老师，而鼓楼医院也不敢收治这样一个重病号，甚至连鼓楼医院请来的换药的护士都不敢给任老师换药。作为学生，我自然是坐不住，我决定要去南京。但我担心，我的到来可能给任老师和吴老师带来不便，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定告诉吴老师。没想到，谈话一开始我就后悔自己的这个决定。我很失望，跟吴老师你来我往地聊到了深夜，却也没有能够说服吴老师。这种时候，我真不知道我是该选择逆吴老师的意思一意赶往南京，还是应该顺两位老师的心意，犹豫之间，只好再次退掉了这张车票。

车票虽然退掉了，但实际上，我的心已经飞到了南京。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任老师的病仍在恶化，几乎每天都会传来不太好的消息，和任老师所有的学生一样，我每天的心情都会随着这些消息好坏程度不一而起伏。曾几度，我因为得知任老师情况不好而彻夜失眠，我知道我一定要去看看任老师了。有了前面两次的“经验”，我似乎更加坚定我该如何做，才能让此行顺利成行。为了不让两位老师担心，我把孩子放在了家里，凌晨出发，在杭州和任老师的另一位学生会合，坐高铁到南京，感谢高科技、高速度成全了我们起飞的心愿，我们早上9点多便抵达了南京。我们径直赶往南京大学校医院。

从我们进病房到出来，一共有45分钟的时间。在任老师门下上学的时候，我们跟任老师一起度过了无数个普普通通的45分钟，而这个45分钟却让我终生难忘！到病房门口，透过房门的玻璃，我看到任老师躺在病床上，瘦弱苍白，我的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流。此刻，我真后悔，我应该早点来看他！任老师看到我们来了，跟吴老师此前和我说的一样，他很激动地跟我说，“你看你的孩子那么小，这么远的路，你还跑过来，这不是让老师难过吗？”我心里想，病到这么重，他不仅没有责怪我们没来看望他，却为我把孩子放在家里来看他而难过！老师难道忘记了，下班后、节假日、休息时间，他把师母和女儿丢在一边，为我们加班加点修改论文？或者他压根就没有想过，受过他恩泽的学生当以涌泉相报才对？

病床上的任老师虚弱不堪，不能说很多话，更多地是我们说，他来听。听说我们的工作有了新的成绩、生活有了新的起色，他艰难地点点头，这是他最感欣慰和鼓舞的事情，我想这也是他最想听到的！看到我们都取得了成绩，他还特意叮嘱我们，一定要注意身体！最后，我们看到任老师很累了，准备起身要走。任老师突然提高音量问我，“你的博士学位怎么样？”“我有一个想法，想把我的博士学位和你的博士学位放在一起出版。我身体好的时候，我是想亲自操刀来做这个事情。”我怕任老师难过，安慰他说，等他身体好起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他见我如是说，声音更大了，“现在，我是指望你来做这个事情！”在一旁的刘成老师赶紧帮腔说，他想让你来做事呢，赶紧答应下来。我含着眼泪狠狠地点了点头。他看到我点头了，似乎大舒了一口气，我很清楚地看到他刚才因激动提高音量而抬起来的肩膀放松了下去。我还在南京的时候，一次跟任老师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突然提到，“我现在对美国宪政有兴趣，可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又会转到其他领域的研究中来”，然后他朝我说，“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又回过头去做我的美国援华，我们一起出一本《美国援华史》。”

我原本以为，这只是老师的兴起之辞，虽然有此印象，却没有当真，没想到任老师还真的有这样的想法。

由于癌症和发烧而带来的双重疲惫感让任老师的身体倍加虚弱，45分钟的谈话似乎就已经超过了他的限度，我们匆匆地跟任老师说再见，他艰难地侧过身来，特意朝我们挥挥手，说“再见！”的确，在跟任老师交往的8年里，我曾无数次跟他说再见，但只要学生有事情，一个电话、一封邮件或是一个短信，一定能够见到他！唯独这一次，他却没有能够再见到我们，而当我们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便已经是天人永隔了！

学者的“纯粹”——写在与东来先生合著付梓之际

江振春

一直不愿接受恩师已逝的现实，恍恍惚惚地生活在回忆中。与东来先生合著的《比登天还难的控枪路——持枪权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研究》付梓之际，才真真切切感觉到“书将出，而师不在”，不免伤感。该合著是我师从东来先生治学的一个成果，6月将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万万没料到，它却成为彼此最后一本合著。张千帆先生在他的纪念东来先生《天堂是座图书馆》一文中曾说：“日后祭东来，却很简单，放几本书足矣。”但愿东来先生在九泉之下非常喜欢这本书。

2008-2011年，我跟随东来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由于我从小喜欢历史，2004年我从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毕业后很想攻读史学博士学位，在南大两位教授的建议与推荐下决定报考东来先生的博士生。他们认为，我本科阶段学英语，硕士阶段学法律，又想读世界史，师从东来先生是很好的选择。在南大读硕士期间，对东来先生就有耳闻：他是著名的知美专家。当然，也有人偏颇地评价东来先生，说他“崇美”，整天替美国唱赞歌！东来先生也曾到法学院做过关于美国宪政方面的讲座，深受学生欢迎。我对东来先生最直观的印象还是他的代表作《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第一版）。这本书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这也成为我决定报考东来先生博士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报考东来先生的博士生并非一帆风顺。2006和2007年连考两年，均未录取。在所有报考东来先生的考生中，我的笔试成绩并不差：第一次笔试是并列第二名，第二次笔试是第一。我不知道东来先生为什么看中我。2013年3月的一天，我去南京军区医院的病房看望他，东来先生才告诉了其中原委。当时他握着我的手说：“振春，说实话，刚开始我对你有偏见——就是你报考博士生的时候。那时我以为你有稳定的工作，也有赚钱的机会，不可能坐冷板凳做学问，认为你只是混个文凭……”东来先生病榻之语，着实让我有点意外，更让我感动。说实话，我从未有过一丝怨言，相反，我对东来先生一直充满感激，因为他是一个认真严谨的人。

2008年我如愿考上东来先生的博士生。第一堂课记忆犹新。他送新版《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一书给我，并签上“江振春同学惠存任东来”这几个字，然后开出了涉及美国最高法院的书单，其中就有罗伯特·麦克洛斯基所著、由他翻译的《美国最高法院》一书，该书是东来先生给南京大学中美中心学生上课的必备教材之一。第一堂课主要讲授研究方法和技巧，特别是如何查阅资料讲解得比较充分。第一次课快结束的时候，东来先生把我们带入中美中心图书馆手把手教如何查阅图书资料。东来先生的课程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他提的问题多，其二是英文阅读量大。在每堂课开始前，他都发给我们一张纸，上面打印了他要提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查阅很多相关材料。上课时他不时发问，犀利无比，让我们非常紧张。因为听课也就几个人，每个人每堂课都要回答他好些问题。回答不出问题，他就咂嘴，问：“看书了没？”因此，东来先生的课我务必要准备充分。他要求我们要仔细阅读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庭意见（opinion），并再三告诫我们：研究美国宪政史，就必须研究美国最高法院；研究美国最高法院，就必须研读最高法院法庭意见。英文法庭意见是第一手资料，务必自己亲自查阅研读，不要偷懒，更不要人云亦云！的确，研读法庭意见是个苦差事。最高法院法庭意见长短不一，有的长度达到了200多页，阅读起来相当枯燥的，对英语阅读水平要求也比较高。的确，研读法庭意见是治学美国宪政史必备技能。

回忆跟随东来先生的治学经历，深感收获颇丰。东来先生和我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想弄清楚美国的持枪问题，彼此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写一部关于美国“枪与宪政”的书。早在2004年，东来先生就撰写了《枪的政治：自由的代价》一文，对美国的枪支管制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去管窥美国的枪支管制。在美国，枪支泛滥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宪政问题，这就是“控枪比登天还难”的原因。不少国人发出了以下感慨：“美国持枪犯罪严重威胁公民的生命与人身安全”严重侵犯了人权！（摘自《2012年美国人权白皮书》）。很多国人提出以下疑惑：死伤这么多人，政府干啥子去了？为啥不一禁了之？很多国人也挺自豪：在“非常时期”，我们政府甚至可以做到实名制买刀，为啥美国政府连枪都禁不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是美国枪械泛滥的根源，禁枪必须要迈过第二修正案这条坎。事实上，废除第二修正案几乎不可能。第二修正案虽只有27个英文单词，但博大精深，意义深远。第二修正案至少体现了美国以下宪政精神：一是联邦政府和常备军不可信，有枪的民兵（代表人民）可以制衡它们，政府胆敢胡作非为，实施暴政，人民有权用枪去革命；二是自卫权是天赋人权，持有武器的权利是一项比宪法还早的权利，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放下武器，就放弃了自卫权，放弃了反抗压迫、保全自己生命的权利。因此，除非把这两点宪政精神彻底从美国人脑子里抹掉，否则禁枪不可能实现。更何况，在当代美国社会，枪支利益集团、两党政治、联邦制问题、自由与保守意识形态等一系列因素掺和进来，相互纠结，使控枪前途更加扑朔迷离，困难重重。写作《比登天还难的控枪路》的初衷是让中国读者客观、理性而全面地看待美国枪械管制问题。

枪械问题严重割裂美国社会，持枪派和控枪派都扛着“捍卫人权”的大旗，而彼此反对的对象却截然不同。枪械问题是美国“文化战争”的主题之一。第二修正案是美国枪械泛滥的宪法基础。第二修正案到底啥意思？它是如何入宪的？它保护的是个人权利还是民兵集体权利？个人到底有无权利持有和携带武器？这些问题争吵了两百多年，联邦最高法院也三缄其口。时光荏苒，转眼到了21世纪。联邦最高法院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东来先生和我恰好赶上了好时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08年的“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案”（*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和2010年的“麦克唐纳案诉芝加哥市案”（*McDonald v. Chicago*）对第二修正案做出了解释。在“赫勒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破天荒地做出判决：个人拥有持枪的权利。“赫勒案”洋洋洒洒的上万言的法庭意见其实就是一份考证严密、推理严谨的学术论文，让我们叹为观止。多数意见不仅严谨地论证了个人拥有持枪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美国宪法解释的多重面相。以这个案件为背景，东来先生和我在《读书》（2009年第9期）上合著发表了《持枪权与美国宪法的解释》一文。该文是我第一次和东来先生合作。我们合作的方式是我写他改。在他批阅修改过程中，我逐渐体会到了东来先生的认真严谨的研究态度以及“以案说法”、以点带面的写作风格。除此之外，我们还合写了两篇长文：一篇是《浅析

美国最高法院宪法裁决中的平衡解释模式——由“赫勒案”谈起》，该文发表在《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秋季卷）上；另一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中的自然法解释》发表在《美国研究》（2011年第2期，被人大复印全文转载）。关于自然法解释的这篇文章我在东来先生指导下，从写作到发表历时2年多，经过多次修改、不断“打磨”，最终成文。可惜，这篇文章，东来先生并没有参与署名。因为刊登自然法一文的《美国研究》那一期有东来先生另一篇纪念文章《结缘美国所》，同一期作者不能同时出现两次的原则，东来先生就不宜署名了，我深感不安，东来先生安慰我说：“《最有权势的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研究》一书收录这篇文章时，我会署名的”。说实话，这篇文章我差点放弃，因为要看的英文资料太多，时间跨度比较大，几乎涵盖了美国最高法院整个历史，写作起来难度太大，需要不停修改，感觉很苦。但是，东来先生告诫我：“文章不厌千遍改！”在东来先生的鼓励与殷切希望下，我最终没有放弃。我现在还保留了这篇文章从第一稿到最终发表所有的文档，大改有10多次。其实最苦的还是东来先生。东来先生密密麻麻的修改批注，不仅记录了这段难忘的创作过程，也见证了东来先生对我的严格要求。2010年6月28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麦克唐纳案”中做出判决：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是一项个人基本权利并适用于全美各地。这一裁决石破天惊。同“赫勒案”一样，“麦克唐纳案”的法庭意见也堪称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典范，同样值得深度挖掘。记得2010年6月30日，也就是“麦克唐纳案”宣布判决的第三天，我把“麦克唐纳案”法庭意见送给东来先生。2天后，我在他办公室彼此交流“麦克唐纳案”法庭意见的心得。他显得非常亢奋，连连说：“最高法院了不得，非常大胆，真敢判啊！有看头，值得研究”。其实，每次和东来先生面对面交流都是一段美好时光，现在都成为一段美好回忆。东来先生研究视角总是那样独特，考虑问题总是那样深邃。以“麦克唐纳案”为背景，东来先生和我合写了《持枪权和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解释和吸纳》和《持枪权与美国联邦制》两篇长文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和《学术界》（2012年第7期）。师从东来先生的经历，让我真正懂得了“言传身教，诲人不倦；身正为师，学高为范”这些词语的真正含义！

2011年6月我博士毕业。读博岁月是我人生最难忘的岁月。感谢东来先生培养了我的学术素养，更让我爱上了美国宪政史。正如我在这本合著的前言最后一段所写的那样：“东来先生把我领进美国宪政史的学术殿堂后，而他却‘打起绿色的包袱，打起绿色的信念，男儿要远行……’”

东来先生在2000年之前是中国一流的外交史专家，2000年之后，他改变研究方向，致力于美国宪政史的研究。他毕生的理想是在我们土地上竖起一面美国宪政的“镜子”，为中国的宪政研究与法治提供一个参考系。他以历史事实说话，客观公正评说美国宪政历程，以史家特有的会讲故事的叙事方式进行美国宪政的“普法”工作。张千帆先生对东来先生评价

很高，正如他在《比登天还难的控枪路》的序言所说：“对于普及宪法知识来说，历史学者很可能比宪法学者更合适”。除此之外，他身体力行，践行他心中“社区自治”的理念以及其他宪政理念。他有很多未尽的心愿，“美国宪政历程三部曲”完成了前两部，还剩下最后一部《美国宪政的守护神——10位最有影响力大法官的司法人生》没有完成。在逝世前几天，东来先生在极度虚弱下特意委托胡晓进师兄要完成本书后期工作。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抽取美国宪法重要条款（特别是修正案）进行历史叙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出其中的宪政精神与历程，这个研究计划本来打算5年内完成。他还有许多我未知的研究计划。东来先生的逝去，使得这些“普法”愿望和研究计划难以实现了。

二

东来先生为人处事非常简单、清澈见底。东来先生总是按照美国的方式处理师生关系，维持着恰当的距离。我和他的家（当时他还住在“曲水文华”）步行也不过12分钟左右的距离。然而我迈进东来先生家的门却花了我几年的时间。我第一次到东来先生家做客已是2011年5月庆贺东来先生50岁生日的时候了。那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同门聚会。师母吴耘教授亲自下厨，为我们精心准备了比萨饼，记得比萨饼的丝拔得很长，我们吃得很过瘾。那晚东来先生也非常开心。除此之外，学生过年过节拜访一概拒绝。记得2009年春节，我提出要给东来先生拜年，没想到东来先生却这样直白说：“你虽是个有工作的人，但是，你我之间还是师生关系，要维持一定的距离，否则会影响我对你的学术判断和其他价值判断。”当时我很愕然，从此我再也不提登门拜年；2009年的教师节，师弟师妹们要买花给东来先生，东来先生再三拒绝；2009年年终，几位同门师兄相约东来先生聚餐。东来先生这一次竟破天荒同意了，如约而至。吃饭时，东来先生依旧神采飞扬，指点江山。正当我们听得兴起时，他戛然而止，突然说：“今天就聊这里。服务员，算下今天的账，每人摊多少？”……其实东来先生并不喜欢和学生在一起吃吃喝喝，但是一年一次的年终聚餐还是有的。在我记忆中，几乎都是东来先生自己做东请学生吃饭。2010年春节前夕，东来先生在新街口的一家饭店请学生吃饭，他很想把这次聚会弄成家庭聚会，因此特别嘱咐我们带上家属或女（男）朋友。那一次，我们全家三口毫不客气地如约赴宴了。年终聚餐有一个环节非常有意思，每个人都要把全年的学习和工作的成绩拿出来“晒晒”，末了，东来先生还要点评一番，鼓励一番。

东来先生的直言快语，不绕弯子，率真的个性特别鲜明，有时的确让脸皮薄的人难堪；但是，很多人（包括被他批的人）不得不从心里佩服他、信服他。他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尤其是学术上的事。清晰记得2008年博士生面试的时候，他冷不丁问了我一个问题：“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请你谈谈美国总统选举中的选举人团制度。”我支支吾吾，回答得非常牵强。他绷着脸对我说：“研究美国宪政，要关心美国时政，你要弄清楚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

和运作，读死书、背死书没用！”还记得有一天同一届其他专业一个女博士生带着哭腔对我说：“你导师太凶了。南大博士生出国进修资格面试，任老师是评委之一，他用英语发问，我口语不利索，回答不理想，他把我说得很难为情。”从师三年，我还是比较幸运的，也许是在职的原因吧，东来先生很少批评我。记得2009年3月我被批一次。那次他批阅我的论文，突然火起，打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一见面，劈头盖脸地对我说：“亏你还是学英文出身，你看看这几段文字，像这样的问题我说了很多遍，臭毛病还是改不了。你的翻译腔太浓了！汉语能这样说吗？你能不能把这些长句切割下，符合汉语习惯。你看看，翻译过来的汉语被动句太多了……”这次面批让我终生难忘。当然，如果写出来的文章符合东来先生的要求，令他满意的话，他也会当面夸奖鼓励一番。记得我写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和法官助理制度》（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一文发给东来先生看的时候，他非常满意，对我夸了一番，因为该文类似于命题作文，由东来先生命题，我独立完成。东来先生的鼓励、夸奖让我欢喜了好一阵子，也让我更加喜欢美国宪政史。这就是率真的东来先生！不隐藏，不做作，有个性，这一切源于他具有很多学者所不具有的“纯粹”，就学术谈学术，不掺杂任何与学术无关的杂质，他身上没有国内很多学者所具有的老成、含蓄与客套，他直来直往，有话就说。

三

2011年7月我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法学院深造学习。临行前，东来先生打电话叮嘱我：“去了美国，不要老呆在图书馆，要多旅行，要多参观一些博物馆，多参加些学术会议……”。东来先生到美国最喜欢逛的地方就是博物馆，因此，他强烈建议我要参观当地的博物馆。他还向我介绍了他游学美国的经历与经验。我和东来先生再次见面的时候已是2012年5月上海大学承办的第十四届美国史年会了。他刚从美国回来，还未倒时差，就积极投身本次会议的组织工作。当时他的身体就已经虚弱了，但是他诙谐、犀利的谈吐没有改变，风采依旧。2012年7月4日，美国国庆节，他查出罹患淋巴瘤。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吃惊不已，甚至萌发过“这是误诊”的念头。后来我打电话给他，他语气平缓，反而安慰我：“没事的，我查了，这种病生存的概率还可以。”7月中旬去北京参加学术活动回来之后，就住进了鼓楼医院，开始了漫长的治疗过程。病中的东来先生从未放下他心爱的学术。2012年12月26日是高华老师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出于一种特别的感触，东来先生很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写一篇文章纪念老友高华。2012年12月20日晚，趁着从医院回家疗养的间隙，东来先生打开电脑，拖着病体，艰难写作，他极力想完成这个心愿，一直写到深夜，可惜这篇文章完成还不到三分之二的时候，体力严重不支，病情加重，天亮后重回医院。这篇未完成的文章成为东来先生心中永久的遗憾；2013年3月20日东来先生好

友、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赵穗生教授到上海参加学术会议，绕道南京为南京审计学院 30 周年校庆做讲座。东来先生觉得机会难得，于是在病榻上联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也安排赵教授做一次讲座，并对自己不能亲自陪同表示惋惜；在东来先生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他一直关心这本合著的出版。他对这本合著充满了期待，希望能看到它早点出版。原本他打算对该合著再进行深度润色加工，可惜他身体太虚弱，没有能力完成了。虽然体力不支，但他脑子还是想着学术，眷念他的学术。2013 年 4 月的一天夜里 11 点半，东来先生打电话用疲惫的声音对我说：“振春，我觉得我们书的名字叫《比登天还难的控枪路》也许更好些。原来的标题就作副标题。”我说：“任老师，这么晚了，您就不要想这些了，身体要紧啊。”东来先生却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一句话：“夜深人静的时候，面对着天花板，除了考虑生与死之外，不自觉地就考虑了学术上的事。”这本合著一直没有序，一次高烧退后，东来先生又打电话给张千帆教授，请他作序，张教授欣然同意。序写好后，女儿琬洁大声朗读给他听，他非常满意。东来先生特别交代：要给这本书写一个致谢，感谢曾帮助过我们的人。4 月底，东来先生看到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他比较满意，并提出了一个小瑕疵……病中的东来先生割舍不下他心爱的学术，他为学术而生！他活在学术中。

从 2012 年 7 月到 2013 年 1 月，东来先生对自己的治疗还是充满信心的，很乐观，也很健谈。自 2013 年 1 月以后，他的癌细胞远程转移到腹股沟处并形成深度创伤的时候，东来先生自己也隐约能感觉病情在恶化。为了不让吴耘老师担心，他表现出轻松状；而吴老师为了让他心里压力小些，让医生做两份病历，假的病历给东来先生看，而真的病历却放在她那里。我在军区医院替东来先生办过一次出院手续，同时从医生拿到了两份病历，当时吴老师再三嘱咐我：两份病历不要搞混淆了，不要让他看到真病历！在生死面前，东来先生真正最割舍不下的是师母吴老师和女儿琬洁。他曾对我说：“我走了以后，春节有时间你们就去看看吴老师。”东来先生和吴老师从南开一路走来，携手前行，风雨二十多载。对于女儿，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参加女儿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硕士毕业典礼和女儿的婚礼，这也成为他积极配合治疗、忍受化疗痛苦的最主要的精神动力之一。他曾对我说：“哪怕再给我 5 年时间。”的确 5 年时间足可以实现东来先生很多愿望。在没有生病之前，东来先生的家庭简直堪称完美：自己事业有成，妻子贤惠，女儿聪慧，家庭和睦，人人羡慕。可惜，病魔生生地摧毁了这样的幸福。经历数不清的漫漫长夜，多少次的以泪洗面之后，吴老师和琬洁最终还是挺了过来。琬洁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吴老师虽然不是教徒，但潜移默化受到宗教的感召，宗教的力量与信仰支撑着她们走过最暗的时光。

有人曾说“死亡并不可怕，而等待死亡的过程才可怕”。可对东来先生来说，等待死亡却是那样坦然与从容，这个过程中东来先生所做的点点滴滴，非同寻常，让人感动：在等待中，他发短信告诉家人不要难过：“……人生有时很残酷，有时只能归于天命！”他让吴老

师拍下院子中他亲手栽植的玫瑰花盛开模样的照片给他看；他催促琬洁带外公外婆去莫愁湖多拍些照片，因为那个时节莫愁湖很美；他委托好友买 24 朵红玫瑰给吴老师。他曾对我说：“明年和吴老师结婚 25 年，银婚，可惜等不到”，并发短信给吴老师：“亲爱的，不要难过。要有勇气面对，虽然我要走了，但你的生活还有精彩。”他甚至还坦然地叮嘱我：他的追悼会要放些他写过的书，并自谦道，“这辈子也没做啥，就写了几本书。”；4 月下旬，霍普金斯大学授予东来先生霍大“学者协会”成员荣誉（目前中国大陆只有两人获得），这是对东来先生最大的肯定与褒奖。东来先生自然很开心。几天后，吴老师准备把荣誉证书带回家的时候，他还不忘幽默：“不要带回家，就放这里，再显摆显摆几天……”。

5 月 2 日是特别的日子，离东来先生 5 月 4 日的生日还有两天。那天下午李剑鸣和杨玉圣两位教授来看望他。东来先生紧握他们的手，虽然有不免伤感，他还是劝慰他们：人总是要走，要离开，或早或晚……你们要保重身体，不要太辛苦，多锻炼，特别是玉圣，不要觉得自己身体很好……为了不影响东来休息，吴老师和我陪同李教授和杨教授到中美中心东来先生的办公室坐了坐，多么熟悉的地方，可主人不在场。在中心停留时间不长，医院的电话就打到了吴老师的手机，东来先生抢救！随后，我们一路狂奔，赶到病房……李、杨两位教授的火车票是下午 6 点左右，他们执意要把票退了，留下陪东来先生。像这样的抢救，已经经历若干次了。吴老师和我都以为这次依旧像上次那样，能抢救过来，因此，也谢绝了两位教授的好意，他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东来先生。两位教授离开没多久，东来先生生命体征开始出现异常。我明显感到他的双手冰凉，脉搏几乎摸不到。他大口大口地喘气，胸憋闷得厉害，脸色蜡黄蜡黄。尿液尿不出来，非常痛苦。我和吴老师问医生是否需要用导尿管？可东来先生微弱的动作表示不用导尿管，还用尿壶，他不想痛苦地离开。他一手抓住女儿琬洁的手，另一只手紧紧抓住吴老师的手，走过生命的最后历程……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的头脑依旧清晰，走得很安详、很坦然，很干净……

6 月来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过去的几年中，总在 6 月对几个大案做出判决。每年 6 月结束后，最高法院就进入了漫长的休庭期。在过去几年中的每年 6 月，我总少不了打电话给东来先生，报告些重要案件以及法庭意见的阅读心得，电话那头总会响起东来先生美国式的回答：“你好，任东来。”可惜，今年 6 月，再也听不到东来先生充满阳光的回答，永远再也听不到了……

严肃为学敬业为师——纪念恩师任东来先生

张庆熠

一、书香门第，志向远大

任先生祖籍江苏宜兴，1961年5月4日出生于吉林长春。先生父母都是五十年代支援东北建设的高级知识分子，二老从温暖的南方来到天寒地冻的北国春城吉林长春，任教于吉林农业大学。据任先生的哥哥任东波教授回忆：先生自幼在浙江宁波外婆家长大，外婆是童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在外婆悉心教导下，形塑先生一生宝贵特质的种子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例如：“东来少年离家，与外婆一起生活，养就了外婆所拥有的一切美德：勤俭节约，生活简朴，敝帚自珍，反对浪费；他乐观豁达，热爱生活，积极向上，充满阳光；他乐于助人，为人诚恳，虚怀若谷，善待一切……”东波教授清楚地记得：1978年夏，文革后第二次高考前夕，他与弟弟东来谈到今后的人生规划和理想：“东来是有胸怀、有抱负、有才干又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他的人生理想是从事文字工作，成为一名记者。”先生后来的人生轨迹表明：尽管没有成为著名记者，但他终身以文字工作为业，读书写作，教书育人，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著名学者，没有辜负他年轻时的理想和抱负。

对学术事业，先生投其以诚，报之以忠，终身以学术为业，矢志不移。他将学术融入生命，融入生活，是一名真正的学者。先生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标准很高，不仅如此，他还言传身教，手把手地教给我们这些初入学术殿堂的小菜鸟们什么叫学术？怎样严肃对待学术？怎样严谨做学问？

先生指导的第一名博士研究生，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胡晓进博士回忆：“任东来先生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激情、最具天赋、最为敏锐的学者，他对一切新鲜的学术资讯都抱有浓厚的兴趣，能以极快的速度把握其核心内容，然后简明扼要地表达出来；其思想之活跃、思维之敏捷、思路之清晰，常常令我钦佩不已。他对学术问题，似乎有与生俱来的热情、领悟力与理解力，学术完全成为其生命的一部分。”

在病重之时，他心里惦记的还是他心爱的学术事业。3月23日晚，因高强度化疗致高烧不退，师母吴耘老师给我们全体学生发来短信：“任老师三天来高烧不退，刚才他说梦见天堂是图书馆的样子，天堂就是图书馆，图书馆就是天堂。”

4月4日，先生去世前一个月，亲自给我打电话交代撰写书评，评介最新出版的美国最高法院研究著作；4月29日，先生去世前3天，在病榻前，他与胡晓进博士讨论美国宪政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美国宪法的守护神：十位最有影响力的大法官的司法人生》编撰出版事宜。在生命的尽头，先生为学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诚如先生生前好友，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所言：“东来教授曾在病榻上对人说，死亦不足惧。因为在他看来，天堂就是一座图书馆，到那里可以继续读书写作。对于凡夫俗子来说，图书馆可是一个够寂寞、够清贫的去处，但东来是一位纯粹的读书人，图书馆正是他的理想安息地。”

二、严肃为学，格物致知

先生学术兴趣广泛，才思敏捷，在中美关系史、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美国宪法史、美国最高法院史、学术批评与学术规范等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尤其是在美国宪法史、美国最高法院史研究领域，先生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为学界同仁所称道，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都很认同先生的文章和著作。

先生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著作是与陈伟老师、白雪峰老师合著的《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二十五个司法大案》。《美国宪政历程》这本书从筹划到写作，再到最终出版，前后历时两年有余，三易其稿。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评价该书：“我觉得本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通过对联邦最高法院在过去两百余年 25 个重大案件的审判的再现，向读者展示了一部形象的美国宪法史。这幅历史图画在细节的刻画上栩栩如生，而评论则从大处着眼，要言不烦，对于相关制度演进的过程及其历史和现实的意蕴给予了深刻的揭示。”任东来、陈伟和白雪峰三位先生精诚合作，共同努力，用通俗的语言、流畅的叙事、严谨的注释、细致的介绍征服了广大读者，自 2004 年出版以来，该书畅销不衰，好评如潮。

说到写作《美国宪政历程》这本书的由来，我觉得还要从国际形势变化的大环境和学术兴趣变化的小环境两方面谈起：

首先，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土崩瓦解，以美苏两极对峙为主要特征的冷战宣告结束。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大超出了先生和陈伟老师此前作出的预计。任陈二先生都敏锐地认识到：我们中国不仅要善于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过程中吸取沉痛的教训，还要善于躬身自省、见贤思齐，向美国学习治国理政方面有益的经验 and 做法。1994 年，受伍德罗·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中苏问题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国际冷战史研究项目邀请，先生造访华盛顿，出任研究员兼客座教授。先生并没有埋首图书馆，搜集资料，只是搞纸面上的研究，研究书本里的美国。相反，先生利用这一宝贵机会，如十九世纪法国贵族托克维尔般东西游逛，参观五角大楼，到国会山旁听听证会，去联邦最高法院庭辩现场凑热闹，广泛结交美国各阶层人士，力图近距离地观察美国、了解美国、认识美国。

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书本上读到的理论知识加上现实游历获取的宝贵经验，先生两条腿走路，两只眼睛看美国，大大加深了他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

认知。在此基础上，先生撰写了第一篇观察美国宪政体制的文章——《在美国焚烧国旗是否合法？》，发表在《读书》1995年第10期。该文详细介绍了1989年“焚烧国旗案”的来龙去脉，文笔流畅，点评精当，思考深邃，令人耳目一新，这可以视作是先生转换学术研究方向的起点，此后不断有文章和时评面世。

后来，先生在一篇学术访谈中回忆：“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难产，最高法院的判决一槌定音，让我再次感受到了法治的权威。多年来对美国的观察和研究，促使我思考美国繁荣强盛的本质，或许宪政是一个根本的因素。”在《美国宪政历程》这本书的后记《一次愉快的精神之旅》中，先生也描述他研究美国宪政的心路历程：“我将努力寻求一个法治相对健全、宪法为其立国之本社会的法治精粹和宪政经验。在具体作法上，利用自己作为历史学者善于叙事、对细节的敏感和对美国历史发展背景熟悉的优势，来讲述美国宪政法治发展演变的故事。”

其次，2000年前后，先生大踏步地退出中美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两大领域，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转向美国宪政、美国最高法院研究，没有丝毫留恋和不舍。先生曾经告诉我退出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放下已有的积累和积淀，去从事一场学术冒险，开拓全新的研究领域，并没有想象得那么难。从中美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跳转到美国宪政、美国最高法院，看似跨越的幅度很大，但细细想来，只是研究的对象改变了，研究者业已掌握的思路、方法、理念和良好的学术素养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些看家本领都可以在广阔的新天地大展用武之地。从这个角度来看，先生转换学术研究方向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无论是先生的师友，或是我们学生，还是先生的家人，都一致认同先生是充满激情的人，他热爱生活，热爱学术，热爱家人，热爱师友，热爱学生；对一切感兴趣的事物，他都充满了研究探索的激情和耐性。反过来，先生这股与生俱来的激情和还影响到了周围的人，催促心灰意懒的人昂扬向上，奋发有为。正像陈伟先生说的那样：“东来对待学术事业，主要是出自内心深处的热爱和激情，有强烈的求知欲，有搜寻查找资料、搞清楚疑惑问题的强烈冲动，有时甚至到了忘我境地。对东来而言，每一项新的研究，都是‘一次愉快的精神之旅’，而且迫不急待要与别人分享感受。”

《美国宪政历程》的第三作者白雪峰先生也是我的授业恩师（硕士生导师），在白老师眼中：“我觉得，任东来教授身上最可贵的特质应该是对学术研究的执着。他并不把学术研究当作谋一教职、挣钱养家糊口的工具，而是视为实现更高的精神追求的途径。就好比加尔文教徒们并不仅仅要通过劳动去生存，而是要借助劳动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是一种更为崇高的精神层面的追求。我想，正是这种对事业的执着，才使得任教授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学术转向，并取得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我与任教授在很多方面的认知是相似的，比如，我们都认为联邦最高法院是推动美国宪政发展的重要机构，但其作用和影响显然在国内并没

有被大多数人所注意，国情也决定了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进行研究是要冒风险的。我们都认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研究是值得付出毕业心血的，我们不求研究的当下效果，但我们都坚信研究的价值，尤其是对未来而言。我们也都认为，历史工作者研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能只把目光放在具体的案件上面，而是要挖掘和分析不同时期影响最高法院司法审查走向的各种因素，包括社会、政治、法律、文化的因素，也包括法院大法官人员构成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等。只有这样，才能凸显历史学研究的特点，也才能使研究更加科学。正是这些共同的认知，才使得我跟任教授能够有很多愉快的合作。如今阴阳相隔，真让人痛断心肠！”

三、敬业为师，尊师重道

5月4日，先生52岁生日这一天，我们回宁参加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回忆起先生对我们的关心和教诲，点点滴滴，涌上心头。

遍览当今高校师生关系：推崇西方前卫模式，师生平等者有之；强调师道尊严，恪守传统师生伦理关系者有之；导师散漫放羊、不管不顾、不闻不问，学生顶撞老师酿成惨剧者有之。中国当下的研究生培养，就像当代变化中的中国社会，异常复杂多样。在任东来老师门下，先生指导的二十多名博士生和硕士生，还有数不清的国际学生，师生之间关系和谐融洽，从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归结起来，与先生敬业为师、尊师重道有莫大的关系。

先生是一名认真负责、极为敬业的老师。他不厌其烦、认真修改我们每一篇习作，帮助我们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和研讨班，甚至为我们不远万里在美国搜集原始资料。站在学生的角度，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先生对学生那份深挚的爱：如果学生有做好学术研究的资质和潜力，先生助你一臂之力，给你提供展翅高飞的平台；如果学生在工作、研究、生活中碰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先生总是伸出援手，不余遗力地鼓励我们，相信我们，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战胜困难。我们不只是把先生当作导师，还把先生当作父兄般的长辈：在学术研究上，先生引领我们；在生活上，先生关心我们；在工作上，先生体谅我们。并不是每一位导师都能像先生这样站在学生的立场，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为学生谋划更美好的未来。

胡晓进师兄曾说过：“任东来先生常对我们说，学美国史有个好处，能长寿。对此，我们深信不疑，因为他的话太有根据了，美国史研究领域的几位老前辈，均得享高寿。1913年出生的刘绪贻先生、1915年出生的黄绍湘先生，已是百岁老人，至今康健；丁则民先生去世时82岁（1919年生），杨生茂先生去世时93岁（1917年生），1920年代出生的曹德谦先生、邓蜀生先生也已年届九旬。任东来先生跟上面的每一位老先生，几乎都有私交，从那些充满温情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重师恩、念旧情的人。”杨生茂、丁则民、刘绪贻、邓蜀生等等如雷贯耳的学界前辈，是先生的先生，他们品德高尚、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豁达开朗。先生一一撰写过文章，回忆与这些学界前辈交往的点滴往事。

翻阅这些回忆文章，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些亦师亦友的学界前辈尊师重道的精神深深影响了先生的处世为人。换言之，今天先生待我们学生的方式如同当年先生的老师待先生的方式一样，薪火相传，代代不绝。也许先生也希望我们待学生的方式能像他今天待我们的方式一样，把美国史研究界的好传统、好做法一代一代传下去。

结 语

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此谓之“三立”。虽研究的是美国的历史，做的是西方的学问，但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立言、立功、立德”之“三不朽”标准来衡量，先生短暂而厚重的一生，道德文章为人称道，著作等身传之后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立言”、“立功”、“立德”皆功德圆满，没留下什么人生憾事。

任先生，您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令我们终生受用不尽。借读书会活动之机，我们来认识先生，纪念先生，既是对逝者的追思和缅怀，又是对生者的鞭策和鼓励。倘若泉下有知，先生必感欣慰！

沉痛悼念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

刘大伟

前天晚上8点左右，接到闫海老师的短信，惊知任东来老师去世了；随后，一位中心校友也发短信告知。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真的面对这一刻，心里久久不能放下。

任老师是我在中心时接触非常多的一位中方老师，我是当时学修其课程《中美关系史》唯一的一名中方学生。先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非常睿智、充满激情，我特别喜欢其大声讲话，突然一停，然后会心一笑的表情。也就是在这个课堂里，我知道20世纪初美国的传教运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也知道了中国的著名大学与美国的深厚渊源。

在课下的接触过程中，得知先生当时正与贺卫方等各个学科的领军人物进行学术规范工作。自觉不妥，遂特别注意学术文章写作中的规范。

先生当时就对法律非常感兴趣，在其不大的办公室里，放着南大法学院进行演讲的一张大型海报。看得出，其对法律的兴趣。也就在此时，先生答应将来有机会一定到辽大来做演讲。就是在这个房间里，我与先生讨论违宪审查机制，并将莫纪宏教授的文章和当今影响很大洛阳中院李慧娟法官事件介绍给先生。感觉得出来，先生当时的情绪较为沉重。遂向先生

推荐朱苏力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后来得知先生也有类似的文章。也就是在这个房间里，我在先生向我发邮件的过程中，知道 WORD 有直接发送邮件的功能。今天，一用到 WORD，就想到了先生。

其间为其修改《改变美国宪法历史的一个脚注》，年少轻狂的我，对文章提了不少意见，先生竟采用多多，后来在《读书》杂志发表时，先生竟然专门发脚注致谢。这也成为我后来向自己学生吹嘘的一个很大资本。

当时教授美国法律的 Anderson 教授学识非常厉害，为人极其和蔼，晚会上的一曲吉它弹唱秒杀无数少女。Anderson 爷爷天下无敌！先生对 Anderson 教授非常敬重，课堂上也专心谈及此事。后来知道，先生将 Anderson 教授的一篇文章翻译后发表在《南大学学报》上。

先生对于美国的大学来历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当时说到季勇勇女朋友的大学是一个马戏团赞助成立的。马戏团也能赞助成立大学，先生的眼神中流露出诧异和佩服的神情！

先生对于资中筠先生的《散财有道》非常推崇，我当即找来阅读。这本书也成为我向学生推荐的重要书目。后来，中心安排我去火车站接资中筠先生和她的夫君时，我兴奋得不得了！也就在那里，我知道资中筠先生是一个多么儒雅的人，绝对不是一个愤青！

我知道先生也在东北生活过，是因为一次先生对我说，他小的时候，学校的农场里就养过二十多斤的大公鸡！

中心当时举办过一场拍卖会，为失学儿童募捐。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先生的受欢迎程度，与一群国际学生竞争的我，没有拍得先生女儿写的书。但记住先生女儿的名字（琬洁）了，昨天在杨玉圣教授的博客中知道先生女儿一切都好，祝福您！

中心快要毕业时，我正在申请一所英国的大学，在中心漂亮的餐厅门口，先生说也要去英国访学，希望我们能在一个城市。心中非常的感动！

在中心毕业前，先生给我留了一个任务，要好好研究美国宪法，争取以后与其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一篇论文。当时的我，一想到《中国社会科学》，好心激动了一阵子！

毕业前，先生签名赠送我其《美国宪法历程:影响美国的 25 个司法大案》。后来，个人非常尊重的王洪晓法官提及此书，个人将该书做为礼物非常郑重地赠与王法官，王法官非常高兴。

从中心毕业后回到辽大以后，经先生许可，我第二年直接报名考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因为自身学业不精，未能如愿。先生从国外发来邮件，遗憾之意，跃然纸上！

后来，先生要求我参加重新翻译美国的一部教材，原因是国内译本很差。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我放弃此事。

此后，一直与先生保持沟通。知道先生有一年没有做学术，而是做了小区业主委员会委员。给我的结论是：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该管的事情却没有管理。受其影响，我前年也竟

聘成为小区业主委员会委员。成功当选的时候，我想到了先生！

个人虽然没有与先生联合进行学术研究，但一直在网上阅读先生的文章，特别是写的追忆几位大家的文章，字里行间，都是先生真性情的表露！

去年8月初，一个中心校友告知我先生得了重疾。得知消息后，立即与郭安康师妹联系，知道确有此事。后与先生短信联系，先生神态很好。遂放心一下！其后，希望能就着到浙大拜访钱弘道教授之机，去南京看望先生。与师妹郭安康联系，郭师妹说先生不希望大家去看他。理解、尊重，遂放下此事。

春节前，知道先生进行化疗，遂购买东北野生的木耳邮与先生。在邮局写下先生名字的时候，心中不觉轻轻一颤！不知道这三个字我还能写多久！

春节祝福，知道先生无恙。喜悦之！

到了三月份，突然接到郭安康师妹的邮件，知道先生病情加重。因为15年前，我的父亲有类似经历，我知道先生可能要保不住了。但心中一直不愿正视此事，拖了将近一周，才回复师妹！

此后，心中一直将侥幸放在理性之上，希望不要发生！

但终于发生了！个人不能去南京见先生最后面，遂到网上找相关的资料，在黄安年先生的博客上看到先生的相片和在纪念碑前专注介绍的样子，我知道先生一直活在自己快乐的世界里。

先生一路走好！

缅怀任东来教授

刘 畅

这段时间，最让中心师生痛心的事情，莫过于我中心著名的美国法学史和外交史专家，中国美国学领域中的栋梁之才任东来教授不幸病逝，年仅52岁，便撒手人寰。

任教授自1988年开始就在我们中心任教，是国内第一位美国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他对于美国法律史、外交史的研究和著作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在这些方面的诸多空白，可谓一代开创之才。然造化弄人，命途多舛，任教授英年早逝，在本该是一个学者学术成就最丰盛的年纪离我们而去，实在让人扼腕。

任教授的离去不禁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同样在壮年仙逝的复旦邓正来教授，以及更早时南大著名历史学家高华教授的辞世。自古文人相轻，而这三位先生生前都保持着良好的学术

工作关系和高贵的友谊，他们的相继离世真是让人唏嘘不已。然而，再多的感叹也无法令逝者复生，生者唯有踏着已然逝去的先生们用毕生精力和学识开辟出的道路奋然前行，才是真正不枉先生们的一生，也才是怀念逝者的最佳方式。

逝者长已矣，生者当奋进，我辈当竭尽全力，振兴学术，造福国家和黎民，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生们的在天之灵。

任教授仙逝的消息传出后，国内外不少学术界的同仁都向中心表达了哀悼和缅怀之情，如北大国关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也在校内撰文寄托了哀思。

在这里，作为中心的一名学子，我真的非常感谢老师们。我去年才来中心学习，那时我就从同学的口中得知任教授已然在与病魔的斗争中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前我也有读过任教授的一些文章和著作，钦佩于他笔下文字的严谨和独到，但很遗憾在中心我没有上过任教授的课，没有接受过他的教诲，但从其他之前就在中心学习、做过任教授学生的中国和外国同学那里，我得知任教授的知识之渊博，为人之和蔼，眼光之宽广，心胸之豁达，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感染着中外同学们。

看着中外同学们在 Google Group 里相互写到的缅怀任教授的话语，从字里行间我能感到他们对任教授的爱戴以及对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的痛楚。我想，虽然我在中心的时间不长，也没有与任教授有过交流，但我有幸与任教授在同一个机构里学习，作为一个年轻学子，我将永远铭记任教授留给我们的精神——那种到生命即将休止的最后一刻都不忘开拓学术的进取精神，它将指引包括我在内的广大中国青年学子在未来的学术生涯和人生道路上不断奋进。

南京大学小百合 bbs 悼念任东来教授的文章

Hidear（亲爱的），信区；D_History

标 题：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发信站：南京大学小百合站（Fri May 3 12:00:11 2013）

和任老师的接触不算太多，但是细细想来却也不少。硕士期间请他写过推荐信，毕业的时候他是我们这个组的答辩老师，偶尔接待国外学者的时候还跟他一起吃过饭聊过天，博一的时候也上过他的课，现在还欠着一篇作业没交，但是谁料到，这以后也交不上了。

任老师为人很有风度，初见他的时候就觉得有种西方气质，果不其然。他做学术很严谨，

为人也很认真，我们上课的时候他邀请我们参加他博士生的论文开题报告，居然给每个人还正式发了一封邮件做邀请函，当时让我受宠若惊了半天。既然有西方的气质，自然少不了几分风趣幽默，印象中不记得听任老师讲过笑话，大概有这种感觉还源于他待人接物比较谦和，也比较喜欢笑吧。有件事情让我一直记得，还时不时总会拿出来跟同学说。就是那次请我们参加他博士生的开题，末了任老师请我们吃饭。吃的是自助，但不是自己去取的那种，还是要跟服务员点的，所以在座的学生多半可能是因为不好意思（比如我），每次都只点一点点；另外的师兄则顾着和老师说话谈天，也没吃多少。总而言之，那次自助我觉得吃得很亏，虽然不花我的钱，却让我耿耿于怀了好久，总觉得浪费了老师的钱，也浪费了老师的心意。不过现在想来，任老师大概就是喜欢和学生相聚一下，就像很多老师一样，吃了多少有没有吃回来又有什么关系。倘若当时每个人都知道两年多后就要和他阴阳两隔，一定要多跟他尽兴地说尽兴地笑。看到很多人说“太可惜太可惜”，这惋惜之余，实在是生出了许多遗憾，比如我没交的作业，逃过的课，还有知道他临终关怀后一直想要写给他的邮件，都只能放在心里，再也没办法实现了。

得知任老师生病的消息是在去年夏末，当时正准备出国，再加上其他琐碎的事情，本来说好和师兄去看他，却没能成行。后来就只有给任老师写了一封邮件，结果谁知道发过去居然全是乱码，后来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又写了一遍中英文的，大概 10 天之后老师也用英文回复了。他在信里面写他很好，而且“full of confidence of recovery”。当时真的是觉得任老师很有精神，也很积极很乐观，这不是对抗癌症的良方么，所以我也觉得他一定能好。大概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吧，这么年纪轻轻的一个好好的人，怎么会说没了就没了呢。如今再看，忽然才觉得这也是一种安慰他人和安慰自己的方法吧。所以任老师真的很坚强，也很有担当，他曾经尽了力，在尽力之后才选择临终关怀，于人于己也都是种释放。让我唯一懊恼的是，应该听师姐的话去校医院探望他，而不是在去过总院没见到他听说他不希望别人探望后就打消这个想法。哎，多说也无益了吧。

昨晚在回宿舍的路上忽然想起那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眼泪就扑簌扑簌地掉下来。这一杯酒又融得下多少情，但柔肠百结的思念和千言万语诉不尽的平生却要在这饮一别中完全消解。指间握也握不住的大好年华，转瞬都成了虚空。只不过任老师，当您回头看，您播撒的芬芳桃李也已香溢满园。您教过还是没教过的学生都念着您的恩情，您这一来一去是满满的收获。花谢存芳，叶落归根。明天，我们送您一程之后，愿您一路走好，九泉含笑！

任东来老师千古！

0or1 (果巴), 信区: D_History

标 题: 人间好物不久长: 悼任先生

发信站: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Fri May 3 12:57:07 2013)

2013年的南京,《致青春》正如火如荼。我没有看过,只身边的一位朋友又一位朋友,她们去看过,还有一位团购了票,今晚要去。朋友说没有看情节,也就不曾留意片中所谓的剧本硬伤,她看在眼里的,是曾经生活中的小道具,是熟悉的一幕一幕的回忆和过往。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国是一方失了序旋转的万花筒,每几年就似乎过了整整一代。如果《致青春》真实反映了当下,它注定不会完整。而于大多数的我们,青春的回忆就是这样的碎片,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切来不及珍惜就已经逝去,残忍、无语。

而在这个春天的五月里,任东来先生走了。南京,因为了这一刻,似乎更变得格外可恶。身为后辈,我不是先生的朋友;作为中美中心 03-04 届的中国学生,因中外教授分别授课,也只听过他几场讲座,不敢称是先生的弟子;我学习美学,不了解历史,更不知道先生的学术成就。可我仍记得与先生共处的岁月中,他与我们一群学生在游玩时的欢声笑语,就时局也曾有机会聆听先生的侃侃而谈。十年之前在夏威夷恐龙湾,我还不会游泳,只能羡慕地看师友们在海水中游弋。任先生就让我扶着潜水板,载我潜水,直到海的深处。我见到了海的沉默里掩不住的生机。一群一群五彩的海鱼,海底的珊瑚在水中映着不一样的颜色,海龟很大,视我们如鱼,自在来去。任先生慢慢地扶着潜水板,小心地不去触碰珊瑚,以免伤害这美丽生灵的成长,做自然里的人最应做的旁观者角色。之后又有两位不会游泳的同学也享受到了这种礼遇。所谓的中西文化差异,在我看来,包含了对学术及人情认知的差异。一方眼中的博学教授,不见得就为另一方欣赏。在中心,任先生是中、外学生都认可的好老师。印象里的先生性格开朗,对生活充满了好奇和热情,在学者的谨严外表后,似乎也带一点东北人的不在乎。虽然不了解,我一点也不怀疑先生具备了成为大家的基本条件,他属于应该被岁月遗忘的一群人,置身局外,兴致勃勃做着自己的事情,像那种在春天里,喜欢在大树下玩泥巴的孩子。

先生走了。我痛恨要在阳光明媚的五月,写下这样的文字,我愿意在多年以后,能有机会指着先生的背影和女儿说:这是南大历史系的任先生,这是,这是,还是这样开心和阳光的任,老,先,生。我不知未来还会怎么来,到哪里去,滚滚红尘中,我们庸庸碌碌,生老病死。我们注定是人生的局外人,可还是会痛惜在岁月的过往中,逝去了的,不应该就这样逝去的那些美好的事与美好的人。

任先生,请您一路走好……

也忆任东来

廖笛衫

二日傍晚，没来由地登陆 SAIS 的 Facebook Group（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居然举目主頁上都是美国同学们的哀悼任东来教授的消息，不禁愕然。

早闻他突患恶疾。去年九月间，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曾受教于他的同学还一同送过卡片，但还是没料到居然走得如此匆忙。

任东来是中国第一位美国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2013 入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者协会。迄今为止中国仅二人获此殊荣。

任教授在我停留中美中心的短暂一年中，学术讨论并不多。但我们算是在入学时有交手，任东来教授在面试中常扮黑脸，三两下便将自视甚高的学生杀得片甲不留。他为人教学都颇有性格，常直言不同意主流马克思主义史观。但实际上起课来，人却好说话得不得了，对于我反复地迟到、不做 Reading，及其他幼稚的行为，都一笑而过。

他的课程，亦改变了我现在播报新闻时的很多看法。仍然记得他一段《冷战史》课上的论述，“历史事件为什么发生在某一年，某一任领导人期间，大部分是偶然性推动的”。

现在我能够有幸涂鸦两笔新闻纸，也算是拜他那本多年前写就的《美国宪政历程》所赐。其书娓娓道来联邦最高法院在过去两百余年间 25 个重大案件：第一修正案表达自由，第五修正案防止公权力滥用。纽约时报案与卡尔·伯恩斯坦，隔着重重太平洋，启蒙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代懵懂学生。正是由于在 07 年读该书，才萌生了考中心、做新闻的想法，当时看来是多么不切实际的想法，确实“偶然地”改变了我的人生。

当下，宪政已然是热门话题，然而 21 世纪初在中国大多数法学院，试问谁会又认真地教授或者学习美国宪法，尤其是权利法案呢？学者在为人冷落时仍能够坚持，最难能可贵。

如果说再读该书我领会到了什么，那就是无论宪政、抑或新闻自由，即使对睿智犹如九位最高大法官（justice），也都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 1972 年的 *Branzburg v. Hayes* 案中，最高法院违背了保证记者在大陪审团前拒绝透漏其情报来源的应有权利。在该案中，斯图尔特大法官曾说“时光流逝，政府手中的权利渗透到了各个角落，这些当权者，不管用什么政策手段，只想永久地存在，而人民才是最终受害者”。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样的权利继续存在着，我们是否能够有力地约束当权者手中的权力。

PS：在我现在所在的城市，新闻记者的收入时有不如苹果店员。曾经想过等工作顺利一些时，将上述从业原因讲给任教授听，没想到就此永远错过了。

方才有一同窗问：他都不在了，你是不是可以转行了？

答：不好意思，他教了我一个很傻 X 叫做理想的东西。

我永远尊重的学者和导师

林 杰

打开学术批评网就看到长篇累牍悼念任东来教授的帖子，心中惊骇不已。

任东来教授是我的母校南京大学霍普金斯中美研究中心的美国史和宪政史专家。当年任教授的《美国宪政历程——塑造美国的 25 个司法大案》，深入浅出，化简为繁，引领我进入美国宪政史这个领域。

我一直都在不同场合向学生推荐这本通俗易懂而又意涵深刻的著作，希望学生能够藉此了解美国的法律史，推动中国走向法治国家。

后来，我又陆续将任教授编撰的《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最有权势的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研究》收录进来。

在我家里，有关宪政与法律史的著作摆了一排书架，而任教授的著作像坚强的哨兵一样伫立其中。

而就在前天，任教授去世了，时年 52 岁。这又是一个学者正值春秋鼎盛之际陨落的悲剧！

我为我的母校痛失高华教授和任东来教授这样的学术精英而痛惋不已。

我只读过任教授的书和文章，直至他去世前，连他长什么模样都不知晓。所以，我谨以一个忠实读者的身份表达内心无限的哀悼之情！

任东来教授将是我永远尊重的学者和导师。他留给世界为数不多的几本著作都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产生绵绵无尽的力量。

愿任东来教授的在天之灵安息。

2013.5.5.

积极投身业主自治实践

——追忆曲水文华苑小区首任业委会主任任东来教授

姚卫东、庄能强、汪家梁、李国英、赵庆、徐银斌、齐鸣、彭晔丹

任东来教授离开我们，即将一周了。但是，南京市曲水文华苑小区的邻居对任教授的思念依旧，思之愈深，念之愈切。我等与东来教授共同为小区奉献而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至今仍记忆犹新：他那铿锵有力的话语，言犹在耳；热情真挚的面容，宛若重生。

众邻居兄弟提议以文字形式追忆我们尊敬的任东来教授为曲水文华苑小区作出的无私奉献，以示缅怀。

一、结缘曲水，初次谋面

南京市鼓楼区凤凰东街56号，毗邻外秦淮河西边，曲水文华苑。小区名援引王羲之《兰亭序》“引以为流觞曲水”之意。该小区座落在南京著名景点石头城公园对面，风景旖旎，是一个离尘不离城的绝佳居住之处。2004年，该小区正式对外销售，我们二百多户来自不同地段的业主，与尊敬的任东来教授一家，一起作为改善性住房人群有幸成为邻居。

首付款以后，我们通过QQ平台建立了小区业主交流群，一起交流购房时的趣闻轶事、心得体会，如同孕妇怀着喜悦的心情，时刻关注腹中胎儿成长；我们也共同关注小区的品质与变化，期盼着早日入住新宅。部分业主首次相约在位于广州路的瑞迪大酒店，共同展望小区未来愿景。参加此次相聚的，除任东来教授外，还有南京水科院的李国英、龙杰以及省武警总队的姚卫东、省电力设计院的庄能强、省人事厅的周大伟等20多位业主。这次聚会也算是小区维权筹备组织成立的诞生地和以后业委会建立的雏形。

在初次见面的过程中，任教授给大家的感觉是：温文尔雅，开朗随和，毫无半点教授、博导、史学专家的架子，全身透露出一股浓浓的书卷气；与人交流时，始终洋溢着笑容；自我介绍时，他谦虚地只说自己是南京大学的老师。于是，我们也都亲切地称呼其任老师。那时的我们，谁也不知道他是声名远播、学术成果丰厚、中国首位美国史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大学者。

2005年，因工作关系，任教授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居住工作半年有余。其间，由于开发商使用了不符合国家建筑规范标准的玻璃，热心业主庄能强和姚卫东组织发动的维权活动，正在艰难而有序地进行着。最终，开发商低下了“高昂的头颅”，花几百万更换了全部玻璃。这样的维权成果在南京市乃至江苏省，是首次。任教授在大洋彼岸，经常通过网络，时时关注小区维权和工程进展等相关信息，并通过e-mail发来各种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把美国先进的建筑装修理念传达给我们。

2005年底，小区正式交付，我们和回国的任老师一家兴高采烈地收房、装修、入住，并正式成为邻居。

二、临危受命，不负重托

入住小区后，由于开发商自身遗留的问题，小区的规范化建设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原有两任物业公司抱着临时观念、挣一笔就撤退的想法，加之小区一直未能成立业主委员会，无人对其监管。因此，也未能认真履职服务并管理建设好小区，以至于小区面貌每况愈下。

此时，业主期盼早日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呼声日益高涨，亟需一个德高望重、能够服众的热心业主出面领导并组织成立业主委员会。

那是2007年的夏季，几位热心业主聚集在时任省某领导的邻居府上。该领导提议请任教授出面，担此重任。任教授说自己未曾有过此方面的经历，既然大家如此信任，愿意尝试一下，也算是为小区奉献一份光和热。针对中国目前的小区物业管理工作现状而言，从事业主委员会主任工作，被认为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费心劳神，消耗时间，甚至影响家庭和工作。对此，任教授心中异常清楚。但是，基于大家的信任与期待，他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个重担。由此，他也多了一份“行政”职务——业主委员会主任。日后，任教授多次风趣地说自己是“赶鸭子上架”。其实，作为研究美国宪政的专家，做业委会主任，对于任教授来说，真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实验。事实也证明，任教授非常胜任。

业委会虽然是民间组织，但该组织的成立仍需按照《物业管理条例》所有的程序申请并备案。为了尽快成立组织开展工作，任教授抱着极大的热情，冒着高温酷暑，与大家开始了忙碌与奔波，跑区房管局街道二站一中心做各种资料的备案，赴公安局申请印章刻制，带领业委会成员考察走访待聘物业公司20多家。业主大会一切准备就绪后，通过逐户上门的业主大会方式投票选聘物业，最后一家物业公司的票数胜出。这时，首先要解决的是新老物业如何安全顺利交接问题。原物业公司提出各种要求和借口，以达到不想离开之目的。

记得那是2008年12月31日，从晚上6点多至11点多，任主任身先士卒，与其他委员一起与前任物业老总反复沟通交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该老总被任主任的敬业奉献精神所感染，表示愿意退出该小区。就这样，一直忙至凌晨，才将新老物业交接完毕。至此，曲水文华苑有了第一个由业主自己监管的物业公司。

三、收复广场，业主联欢

俗话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书要一页一页地读，事要一件一件地做。稍事调整休息后，随之要解决的是小区开放式广场多年来每天晚上扰民的问题。不知何故，小区广场竟然人为建成开放式的，每天晚上有近百人在此跳舞锻炼，高音喇叭的噪音不但影响学生（尤其是参加中考和高考学生）的学习，而且老年邻居尤其是不胜其扰，苦不堪言，反应强烈，矛盾尖锐；双方数次发生肢体冲突，但均于事无补。任主任又一次迎难而上，亲自起草材料，向市区两级政府反映情况：一方面，反复去辖区政府说明情况，澄清利害，建议政府从构建和谐社区的角度，妥善处理广场纠纷；另一方面，登门动员相关业主，运用人脉关系，协力解决小区广场扰民问题。业委会基本上是隔三差五就要开会研究对策，每次会议至少两个小时以上。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各方面力量的关注协调下，终于砌起围墙，将小区广场“收复”进来。小区业主喜不自禁，还燃放鞭炮庆贺。大家也由衷感谢业主委员会付出的辛勤劳动。

人们由此也逐渐知道了我们的业委会有一个学者型的主任——任东来教授。

重点问题解决了，任主任又开始谋划在小区建立一健身器材场，使大家有一锻炼身体的好去处。任教授充分发挥与人交流沟通的协调能力，联系了一位在市体育局当领导的业主。通过不懈的努力，一整套健身器材和篮球场终于安装到位。众邻居看到小区日新月异的变化，流露出喜悦的笑容。这一切喜人的成果，凝聚了任主任和众委员辛勤的汗水。

为了迎接己丑年新年的到来，在任主任的倡议和筹划下，举办了小区迎新年团拜会。此次联欢，是业主入住小区以来首次大规模的活动。为了确保安全，以达到预期效果，任主任又精心组织，亲自召集大家进行任务分工，联系场地、车辆保障，发放通知，连水果和食品购置等，均责任到人，有条不紊。在联欢会上，任主任的爱女琬洁担当主持，还表演了诗歌朗诵，展现了非凡的才气，小朋友古筝独奏，有奖竞猜，联欢内容丰富多样，形式多样。业主们相聚在一起，互相交流，谈天说地，其乐融融，一派祥和。许多业主还利用联欢会，积极捐款，用于小区添置休闲桌椅，栽植花草。

四、殚精竭虑，临时卸任

2011年6月中旬，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任主任召集我们开了最后一次业委会。在回顾总结前阶段工作并安排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后，他神色凝重地对大家说，近期感觉身体很不舒服，深感力不从心，希望自己卸任主任一职，请其他委员代为履职。直至今时，我们方知任主任为了小区的建设与发展，已经过多地透支了自己的健康。此时，距离此任期满还有半年时间。任主任最后一次为小区起草通知，告知全体业主，在最后的半年时间里，由姚卫东委员接任主任一职。我等兄弟们深深知道，任主任如果不是因为健康原因，他一定会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

如今，任教授离开了我们，但他为小区建设和发展所奠定的坚实基础、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将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学习。

最后，谨以一首小诗缅怀我们尊敬的好邻居、好兄长任东来教授：

结缘曲水间，携手维权路。
九载邻里情，历历仍在目。
高义薄云天，天公妒英才。
众邻齐悲恸，永远念东来。

任教授，我们永远怀念您！

2013年5月9日星期四

（本文作者姚卫东、庄能强、汪家梁、李国英、赵庆、徐银斌、齐鸣、彭晔丹，均系曲水文华苑小区首届业主委员会成员）